

红色印记

“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历史考察

□王有加 文/图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列宁对苏俄社会改造与建设的一种革命追求,彰显了列宁对苏俄克服粮食危机、促进社会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抉择,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应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屠杀。在中共的组织和领导下,苏维埃运动实现了由理念、口号到革命建政的跃迁。同时,中共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使得苏维埃政权有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态势下如何扩大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去应对反革命的武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二是如何让民众了解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愿意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三是如何锻炼苏区青年的互助合作精神,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借鉴苏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

参与主体广泛 有助于巩固工农联盟

“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战略需求,面对国民党多次的“围剿”,传统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武装对抗已经不能适应苏维埃斗争的实际,在敌我对比悬殊、苏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其中,才能扭转被动的局势。

其一,参与者不再局限于青年。面对国民党多次反革命的“围剿”,在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动员下,苏区一切革命力量都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从青年团员、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参与其中,并且成立专门的团队来执行“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于反“围剿”军事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央提出了“中央局必须再次组织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立即组织广泛的优红运动,首先每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党员和团员都要加入耕田队,各级工作人员一直到支部书记和乡主席都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在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干部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志们每次出发都很踊跃的去帮助沙洲乡的红军家属砍柴,铲草,挑塘泥,下肥料,犁耙田,什么都做,甚至连人民委员长主席也一齐参加礼拜六”。

其二,运动进一步架起了苏区工农交流沟通的桥梁。在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程中,如何把苏区农民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需要先进群体的示范引领,苏区工人



团员、少先队员帮助红军家属生产。

体积极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把先进的思想观念向农村传播,促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

“除军事工业中有政委的工厂支部,与地方党只发生横的关系(如协助地方工作,请地方党作地方工作报告等)外,其余的工厂应一律直接接受地方党的区委或县委的领导,经常向所在地的党委员会作报告,请求讨论本厂支部工作。一般的工厂支部应有计划的由苏维埃干事领导帮助当地乡支部或小组工作,领导工人实行优待红军家属工作”。

正是中共通过耐心的工作,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断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日益传播并深入人心。

参与内容形式多样 有助于苏维埃政权建设

“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的开展是在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扎实推进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通过此运动又进一步改善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党员关系,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动性。

其一,“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在经济上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通过运动增加了社会合作关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由原来的做工开始

采用货币代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有利于苏区逐渐恢复生产。

“帮助士兵家属做工,以长年十二个月计算,平均每月至少帮助二工,三、六、十各月加倍。无人做工者,折银津贴其家属,不要津贴士兵本身,其家后无人者不必津贴。津贴工款以区为单位,按全区全县人口分摊,分四季由政府征收分发”。

其二,针对工作需要,扩展了运动的形式。对“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的内容在推进过程中,也逐渐灵活转变为对当时反“围剿”紧缺的物资的采购上,“比如到宁化买盐回转须十二天,他可以少帮红军家属耕种十天。这个办法瑞金黄柏区的群众已正在进行着了”。

此外,“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也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会,组织特殊的礼拜六或义务劳动日,进行清洁工作。如扫除房屋,清洁沟渠,与烧垃圾,洁净身体等”。这些举措不断扩大运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运动经验提炼为党内条例 有助于党的建设

中共历来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进一步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以利

于新阶段工作的开展。随着运动的开展,当时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将运动的经验上升到党内的工作条例。

1934年1月10日,中央公布的《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进一步指出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参与成员从共青团员到当时苏区一切脱离生产工作的成员,规定了工作时间及有效时长、工作范围以及对项目运动的检查监督,使“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朝着苏维埃运动奋斗的方向前进。条例也指出,“将本条例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并提到每个支部大会,及代表会议,军人大会,群众大会上报告和讨论,造成礼拜六工作的热烈空气,和自觉的负责的有纪律的按期进行礼拜六的工作”。

与此同时,进一步将执行条例的情况上升为巡查巡视的范围,确保礼拜六工作能够落到实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到别区别乡巡视工作,如逢当地机关实行礼拜六时,必须同样参加所到地的礼拜六工作,并接受当地机关负责人的监督”。

适时把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写入了党内的工作报告,确保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能够落到实处。在当时省苏的报告和党代会的例行工作报告都将其列为报告项目,“严格的普遍的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党、政府、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中央到乡政府乡支部止,必须全体参加,各个机关所在地的红军家属的优待,必须由该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并且作出优待红军家属的模范”。

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对运动实效的监督执行,确保在反“围剿”斗争中能够争取更多的青年参加红军,扩大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一切国家机关与合作社必须准确的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与法令,广泛的进行礼拜六的工作。凡是对于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消极怠工与官僚主义,应当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同时,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红色中华》《斗争》等上加强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的舆论监督,并对违反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条例的行为进行曝光,确保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落到实处。

由于时代所限,“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持续时间不到三年,但是在运动中再一次见证了人民的力量,也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读懂了中国国情,读懂了民心,进一步诠释唯物史观、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虽然第五次反“围剿”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当时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共产主义星期六运动”被迫中止,但其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并没有消失,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彰显其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说史谈届

闽派书画 “批判出新”传统

□王毅霖

历史上的闽派书画艺术精彩纷呈,苏轼的诗句“春江暖鸭先知”缘于品读闽人惠崇《春江晓景图》而成,蔡襄的小楷《茶录》传拓遍布东洋,陈容的龙图震撼与影响了数个朝代,边景昭则开创了明代院体花鸟画的新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上官周的《晚笑画传》对于明清江南的绘画启蒙起到重要作用,弘一法师晚年于泉州写下绝笔“悲欣交集”……

福建的历史传统特殊。唐代以前,这里尚属蛮荒的化外之地。到了宋代,又俨然成为文化礼仪之邦。显然,朱熹以理学开“闽学”之宗,当属重要的贡献。自此,闽派学人渐为国人所识。梳理闽派的艺术脉络,仅书画方面而言,就可交出一份不菲的名单。

书法家中,除了最为著名的宋四家之中颇有争议的二蔡(蔡襄和蔡京,二者均为福建仙游人)外,可以罗列的名家甚多。绘画上,无论是与苏东坡等名士交好的北宋僧人惠崇,还是因南宋灭亡而坐卧必南向,以示不忘宋室,并因之号“所南”的郑思肖,都堪称画坛翘楚。

当然,闽人在书画领域上的成就,真正在全国形成一个群体性影响是在明初。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的出现,以及闽南地区月港的崛起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一时之间,闽南的文化艺术迅速崛起,书画艺术上,黄道周、张瑞图领全国一时之先,他们开创了闽派书画艺术崇写意的风尚。

清中期开始,画坛上闽西三杰上官周、黄慎、华岳的崛起,使闽派画家在全国画坛上再次成为亮点。扬州八怪中,闽西独占二位。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画师,在努力从底层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文人画精神的过程中,铸就了“闽习”这一概念。考究“闽派”书画近现代的传承和流播,仙游的李霞、李耕,诏安的谢焜熹、沈耀初等人一定是标杆性的人物。

时下,我们一再讨论及闽派文艺,以“闽派批评”到“闽派翻译”“闽派诗歌”等诸多层面,理论的探讨与活动的推动已然形成相当的效应,这种氛围感染力十分强大,书法绘画等艺术概莫能外,以“闽派绘画”“闽派书法”“闽派戏剧”“闽派舞蹈”命名的各种活动和理论开始不断地出现。

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汇聚,是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并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文化体系,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标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文化,渊源脉络复杂、多元融合性是其突出的特点。闽派传统艺术的经典之作中,承载着闽文化的历史记忆。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福建,应当努力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工作,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文化认同、凝聚民族认同、涵养国家认同,夯实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考察福建的文化传统,可以从原始的闽越文化开始,古闽越族的图腾崇拜、原始信仰、生活环境以及生存信念等,无疑都直接关系到古闽文化直至当代闽文化的生成。大抵从宋代开始,在每一次社会文化的转型中,福建人总能把握历史的先机,先是宋代闽学引发,思想热烈,影响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国。从元代到明清,无论是元代阿拉伯人在泉州的聚居,或者是明清大量漳州人移居东南各地的盛况,彰显的是闽文化在融汇异邦文明的融通性。而在晚明中国极度活跃的社会思潮激励下,终究形成了闽文化的又一种文化特质——“批判出新”。泉州人李贽当为重要代表人物。近代,在国际海洋文化扩张的背景下,闽人再次把握住先声,在国际海洋文明战略与竞争中,立于民族对外开放的潮头。

表现在书画艺术上,明清两代尤为显著。明末开始,个性的解放促使这个时代的文艺呈现勃勃生机,好新奇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东南沿海的福建,即时地承接了这种社会思想与审美倾向,某些层面上突破或引领亦是情理之中。

以黄道周为观照,这是在周易和理学上堪称一个时代集大成者的孤臣,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许多文献资料记载了他在政治上的铮铮铁骨,表现在书法作品上,楷书敦厚道媚,这是于古雅之中领取的一份个人才情。行草则是体现为一种恣意纵横的绵密盘绕,这是时代与个人融汇所对于传统的一种突破,也是闽派书法在这个点上对于书法史的一次绽放。

同一时代的张瑞图,亦有不菲的成就,一如那个偏离了儒家正轨的晚明时代,张氏以满幅偏锋翻转的行草挥洒着超凡的才情,书法美学的传统再次得以演进和刷新。

清代,闽西的黄慎以草书入人物画,开宋代泼墨写意画家梁楷后的又一新风派。伊秉绶则以朴拙恹恹的线条书写出属于清代书法史、属于个人也属于闽派的静穆气象。

由古至今,许多闽籍文人、学者、艺术家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创新性与创造性,他们的创新追求不断地构建了闽派文化独特的优良品质。

乡土印记

闽侯尚干庵塔

□吴卫 吴爽 文/图

庵塔又名安塔、雁塔,位于闽侯县尚干镇的塔林山山顶上。由梁克家撰写,成书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的《三山志》中提到:“方山在州南重江(今闽江)之外,九鼻东向,正北远望,突兀端方,直下数千尺,故名。”“塔林寺,在方山下,大建年置。”

有观点据此认为庵塔也建于陈朝大建年间,距今已有1400余年。然而《三山志》中仅说“(方山)上有阿育王塔,因而建寺”,却未提到方山下塔林寺里的庵塔。鉴于《三山志》中对寺庙中的戒坛、塔幢、亭榭、碑铭等重要建筑往往有所记载,以庵塔之突出却在书中只字未提,这显然不合理。其实从形制、装饰等方面的特点来看,庵塔当为宋塔,而且可以进一步地推测其修建应是淳熙九年后的事。

庵塔为仿木构楼阁式实心石塔,采用灰白色粗砂岩石材建造,七层八面,塔高约8米,自上而下由塔刹、塔身和塔座三部分组成,其中塔身和塔座布满了工艺精细、题材丰富的浮雕,主要采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剔地隐起”“剔地起突”“素平线刻”,即浅浮雕、深浮雕和线雕三种工艺。

塔刹因早年受雷击,连同第七层的部分塔

檐遭到较大损坏。如今刹杆、刹座基本完整,刹身仅存四层相轮,刹顶的宝珠等构件已不见。此外不知何年修缮时竟又误将刹座置于四层相轮之上,深以为憾。

塔身共七层,第一层的八个面均浮雕佛教西方三圣像,三者结跏趺坐于莲台,面容端庄祥和;居中者为佛陀,肉髻高耸,袈衣博带,手结与愿印,或说法印,或禅定印;左右的胁侍菩萨头戴华丽的宝冠或简朴的毗卢帽,手结禅定印或合十印。其余六层各面皆线刻一壶门,门内浮雕佛像一身,造型与第一层塔身雕刻的佛陀基本无异。

每层塔身有八根角柱,无铺作层,一檐一平座。角柱为瓜棱柱造型,无柱础,柱顶置钵斗承梁。“檐”指八角形的塔檐,以混肚石叠涩的形式出檐,每面塔檐的屋面上有七道瓦楞,所雕刻的瓦从形状上看来是筒瓦,檐口部分瓦当、滴水皆具,细节尽显。

塔檐的所有角梁前端均有一个上下钻透的小孔,原是系风铃之处。遥想昔日每有闽江上的清风拂过,塔上风铃错落作响,清澈空灵之声数里之外可闻。“平坐”也叫阁道,相当于每一层外



全景

围的一圈“阳台”,并可供人通行。由于庵塔没有铺作层,所以每层的平座直接置于下层塔檐上,不设栏杆。平座的雕饰较简单,每面仅以立柱间隔,各做一个线刻的壶门开光。

塔座是庵塔雕饰最丰富精美的部分,由两层须弥座构成。第一层须弥座结构略为复杂,自上而下依次是圭脚、两层下枋、下枭、束腰、上枭。八只圭脚外翻,为如意头造型。两层下枋叠涩收进。第一层下枋的各面间隔浮雕一组四龙的飘带如意祥云和一对飞天。飞天面相丰满,长眉修目,戴宝冠,梳高髻,身披飘带,下着长裙,手捧摩尼宝珠或花篮。

第二层下枋的东南西北四个面分别是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的花卉,其余四面则各雕一对飘带如意祥云纹饰,寓意四季吉祥如意。下枭和上枭分别作单层的覆莲和仰莲雕饰。束腰是须弥座装饰的核心部分。本层须弥座束腰的八根角柱为高浮雕的力士造型,或蹲,或坐,或单膝跪地,肩扛手举,十分生动。各面则间以双狮戏绣球和牡丹的雕饰。

宋代狮子较之唐最显著的变化是向生活化和装饰化发展,不仅造型趋于写实,雕工技艺更加纯熟,装饰意趣也更加浓厚,尤其是身上开始雕有项圈、铃铛、绶带等装饰。牡丹纹在宋代十分流行,构图也更为丰富成熟,时而舒简,时而繁密,充满雍容华贵之气象。这些特点在庵塔的雕刻上都有鲜明的反映。狮子与牡丹,动静等观,相映成趣。

第二层须弥座结构较简略,其下枋和下枭合而为一,下枋表面满饰如意云纹,下枭为单层覆莲。上枭最为厚重,故采用了三层的仰莲雕



塔身